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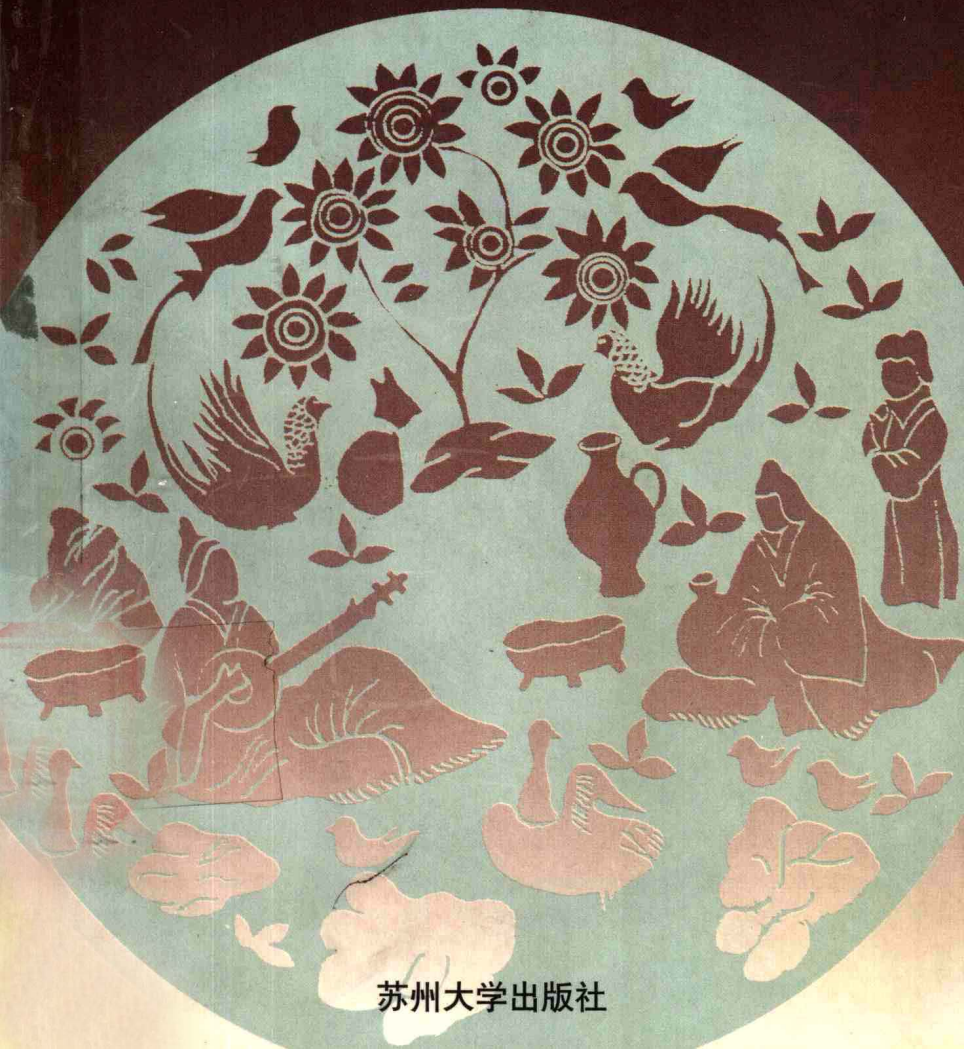
王钟陵主编

中国文人心态丛书

自在 自娱 自新 自忏

——晚明文人心态

吴调公 王 恺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王钟陵主编
中国文人心态丛书

自在 自娱 自新 自忤
——晚明文人心态

吴调公 著
王 恺

苏州大学出版社

自在 自娱 自新 自忏

——晚明文人心态

吴调公 王恺 著

责任编辑 周 敏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地址: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212313)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6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1037-311-0/G·136 定价: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王 鍾 陵

—

景气明远，爽籁惊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民族精神状态史(亦即心态史)——正在兴起。

中国虽有全世界最为完备而连贯之史籍值得我们骄傲，然而稍稍一翻便会发现这浩博的卷帙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世生平以及王朝政治和典章制度的记录。虽然其中也折射出不少民族精神的光华，但我们迄今毕竟没有一部纯粹的民族精神史。是的，我们有哲学史，但哲学史重在对种种思想观念作出论述，并过于抽象，它不对形形色式殊异的心相作出描绘。心性论是中国的国粹，然而其目的又归之于“正人心”三字，那么它的狭隘性也就昭昭明融了。因此，那个因身为僧人而著论非难佛教从而引发了刘宋思想史上激烈的《白黑论》之争的释慧琳，当他找出理由来帮着中华文化说话时，亦不过曰：“是以周孔敦俗，弗关视听之外；老庄陶风，谨守性分而已”(《宋书·天竺迦毗黎国》)。所谓“弗关”、“谨守”周孔老庄之敦俗陶风，实在不过是闭锁心灵耳。而将华夷之辨踩在脚下坚定地站到佛教那边去的大儒士范宁的儿子范泰、儒家世家王谢家族的谢灵运，却振振有词地常言曰：“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高僧传·释慧严传》)范

泰、谢灵运所曰“济俗为治”四字的奥妙，倒还不在于它不期然地供出了儒家六经统治人民的性质，而在于它在暗含一种对世俗的鄙薄的同时，也贬斥了圣谟卓绝的六经典文。灵性真奥的闾域被视为与儒学无关，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到了宋明理学抬头，大儒们出入佛老。然而，那些中庸持平、木讷呆滞的理学家，虽自视为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执礼恭、处事敬、与人忠的醇儒，其实不过是方行缓步、拱谈性命、不通世事的古板冬烘。朱熹曾作《敬斋箴》书壁以自警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足容必重，手容必恭”，“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并耸人听闻地说：“毫厘有差，天壤易处”，活现出一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窘态！陆王心学标举心即理，张扬过甚地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但其发明本心的致良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亦不过是《大学》“致知”说和《孟子》“良知”说的老调新弹；故虽其大弦嘈嘈、小弦切切，自诩致良知说为学问大头脑、孔门正法眼藏，乃“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同上书，卷三十三《年谱》二），也仍然是在儒家闭锁心灵的老路上施展着又一套解数。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破心中贼”，乃高悬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中国古代难以产生民族精神状态史这种著作也就是必然的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鲁迅之多次指责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其思想的投枪确是刺中了庞大的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之要害。

二

然而，人们不会因正统思想的钳制而死灭，我们民族的精

神活动仍然是极为丰富而多彩的：屈子不能变心以从俗的坚贞，荆轲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绝，班婕妤秋扇见捐的忧惧，曹操志在千里的壮心，曹植求贤良独难的中夜之叹，嵇康俯仰自得的太玄游心，左思高眄四海的自重，陶潜采菊东篱下的任真，王褒之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庾信之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王绩的高枕取醉，陈子昂之怆然千古，孟浩然知音世所稀的寂寞，王维深山古寺钟的禅悦，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引吭，杜甫穷年忧黎元之肠热，韩愈歌思哭怀的不平之鸣，白居易对官布掠夺的载指，元稹贫贱夫妻的百事之哀，李绅对四海无闲田而农人犹饿死的悲悯，孟郊一日看遍长安花的快意，李贺天上谣之遐思，李商隐锦瑟篇之缱绻，李煜剪不断、理还乱的亡国之哀，苏轼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悟，李清照的凄凄惨惨戚戚，陆游北定中原的遗志，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夏完淳之南冠思深，谭嗣同之横刀向天而笑，秋瑾之赤铁主义的发愤欲击……真可谓洋洋大观、磅礴万象者也！

至如下层人民中，死麋白茅邂逅相遇的快乐，夙兴夜寐靡室劳矣的叹息，适彼乐土的乌托邦幻想，天上何所有的人间猜测，报以琼瑶的通好之愿，蒹葭苍苍之中对伊人的怀想，子惠思我的戏谑，予美亡此的哀伤，征夫朝夕不暇的怨嗟，游子狐死必首丘的眷恋，孤儿怆怆履霜之泪下泫泫，思妇望夫悠悠宁化为石的执着，《子夜歌》中的田女相悦，《华山畿》中的生死痴情，以及在大的民族斗争展开之际，巷战市人争决命与城破妇女总投渊的壮烈……亦林林总总、浑涵喷薄！

应该强调的是，个体的以至某一社会集群的精神活动，总是同一定阶段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相联系的。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曾说：“心理结构乃思维方式、感受

方式和情感取向之综合”(第 61 页)。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总体上说,表现为一种历时的变动,但是这种历时的变动乃是由一个又一个相互交接叠合的共时的结构所组成,新的圆周和旧的圆周在相当的程度上重合着。这当然是一种纯净化了的描述。在实际过程中,新的因子的发生、积聚往往是随时的、点滴的。在历史的前进中,这些新因子彼此相生、互相协同,在和旧因子的既排斥又相容的复杂的关系中,导致系统的协变,从而组成一个新的文化—心理结构”(拙著《中国中古诗歌史·前言》)。

人是历史的产物,或者说人是在历史中使自身人化的,因而人不能在历史之外认识自身。一体化于现在之中的民族精神的往昔,其实就正是一个民族的本质。民族的精神的历史,在文化—心理结构序化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地新生着。曾经产生过民族种种精神活动的社会形态虽永恒地消逝了,但它的产物却会在历史中不断地展开和实现。

单个的人,正是凭藉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去抵御存在的偶然性、艰难性,并将存在的非理性转化为理性的,于是存在便意义化了。民族精神史的丰富与贫瘠直接决定了这种意义化的度,意义化度的高低则又导致了人性存在的不同方式。因为“拥有一种物质以外的虚的成分——精神的、文化的、审美的空间,此为人性之所在。浑浑噩噩的人,浑浑噩噩的生活,是同动物相仿佛的”(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第 780 页)。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正人心”的统治者,赫然高擎出一种抽象的天理以作为精神的标尺,精神的丰富性——它的矛盾性和多方面意义在善恶正邪的党同伐异和简单剖判中,被极大地戕杀了。原生态的历史也就变成了伦理原则的抽象

物。因而，被导向者的心灵就只有在“天真”中患上空洞和贫乏的恶症了。

由于此种深远的历史原因，所以发掘我们民族极为丰富的精神的原生态，充分表现其细腻的律动，探讨其个体的感性的表现与一个普泛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关系，亦即是构建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史，无疑是我们民族在日益物质化的世界之中拓展一个丰永深厚的文化—意义空间的必要条件。以此，我们方能深入地发展我们对过去进行阐释的能力，从而更多地占有过去，有效地实现自己把握世界的多样性。

在每个时代，一般总是在文人群身上有着最为丰厚的文化沉积。他们大量地吸收着文化，又尽可能地创造着文化，因此在心态史的研究中，文人群应是我们注目的重点。从探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带动整个中国文化的广泛评述上说，这一研究无疑有其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

构建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史，特别是研究文化心态史的意义已如上述，那末这一研究应如何着手呢？从世界范围说，精神状态史也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所以它的路径和方法还是不清晰的。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一研究的特征，不能将这一领域与其邻近领域界划清楚，那末我们就无法为这一研究奠定下最初的基石。

我在主编这套丛书时有这样一些构想与体认：

1. 虽然多学科的综合是目前学术发展的一般状况，但心态史无疑有着更为突出的多学科交叉性。这些相交叉的学科主要有哲学、思想史、历史、文学、美学、艺术、心理学等，此外，

依研究对象的不同，还会涉及更为广泛的领域。因为人怎样改造世界，他的智力便怎样发展，活动的领域不同，精神的特质便不同。阐述这特质的精神之由来时，自然要深入到活动领域之内化为一定的精神特质以及个体的精神性因素又如何外显并影响于活动领域的问题。十分清楚，心态史研究者应具有较为广泛的知识面和一定的专业知识。

2. 心态史研究的目的应在于尽力逼近精神的原生状态。逼近精神的原生状态的首要条件便是应尽力尊重历史，不要用任何抽象的原则去使历史抽象化。我们不能提纯和简化历史。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历史上何止一次地发生过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火燎洪荡的大变动？！又何止一次地发生过英蕊早谢、毒卉滋敷、福善则虚、祸淫莫验的惨痛悲剧？！历史既不是道德律令的外化，又不是理想主义蓝图的兑现，它是非规范的。浅薄的乐观主义，善良的温情主义，简单的历史发展观，难以把握历史的丰满与深沉！

3. 逼近精神的原生状态必然要求一种感性的丰富性。精神是最细微的。所谓精神状态史应是重在状态二字上，这自必要求对心灵共时相的种种因素之冲突、谐合、协变的复杂关系作细致的抉发。心态史应是带着露珠的生香活色的花朵。但是，心态史的研究又不能仅止于表象的描绘，而要深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就必然要重视范畴的把握。然而范畴的理性和感性的丰富性相浑融，这应是一种从感性中崛起的理性。我所企心的乃在于“由高度抽象而达到的云外高瞩的理论视点与丰富的活泼泼流露着生机的原生态感性具象之统一”（拙作《文学史的理论形态化》）。

4. 逼近精神的原生状态，还要求注意精神史的生成性。这就要把握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任何个人，既是在自身中积累了社会—文化意义的存在，又是一个具体而不可重复的个体。个性并不仅是外界环境影响的产物，它还是个人在树立自我生活过程中自我选择的结果。我们应当注目于个性、抱负、气质、学术路径与方法各不相同的个人，究竟将何种偶然性、特殊性带进了当时民族的精神生活中；而这种偶然性、特殊性又是如何在由于一定的历史氛围和价值期待而造成的社会性认同之反馈中，得到意义性张扬，从而在民族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凝定下来的。各种特异而又相互冲突的精神性活动，又是由于何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而经由直接的或迂回的道路在总体化整合中盛衰兴替，并从而左右了民族精神史的生长方向，形成为其具体的行程。

5. 心态史著作应从心理现象、思想传承、时代意脉、风习个性上切入，进而向纵深开掘，写出哲理和文化的深度，并落实到对其时人们何以如此立身、行事、为文、论学、操艺、治政等方面的完满的解释上来。心态史著作所应具有感性内容及其对心相的描绘性抉发，使它区别于纯粹的哲学史、思想史；而其注目于心灵的中介性，又使它区别于单纯的文学史、艺术史。比如以“禅与中国诗画”这一论题来说，就应从禅入于心化而为诗画的角度落笔，即应说明禅如何影响于士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以至生活方式的，此种情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又是如何影响于诗和画，诗和画之意象、风格诸种因素中又是如何见出此种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的？心态史研究是心理学向特定领域的渗透，或者说是心理学在特定领域中的具象化；而其统括形而上、形而下的特征，则又使心态史区

别于州区部居于形而上的美学史。在心态史著作中,殊相性、空间性、纤细性显然突出。心态史应包举万态,将五光十色的众生相尽摄其中。当然,既然是史,自离不开揭示共相,写出嬗变,亦应有雄犷汪濊的气势和笔力。

6. 心态史著作应重横写而略纵写。横向立题便于把握一些普遍性的心态,纵向内容则可化入到横向展开之中,这样既便于范畴性的把握,又可潜有对发展脉络的梳理。正是这样的一种结撰方式,可以鲜明地表现出心态史著作化时间性因素于空间性展示中的独特性。因此,在研究和写作中,应将有关材料取来一一纵读,获致综合印象,提炼出若干新颖深刻的论点,而以综合之笔出之,避免分人逐写。分人逐写易造成对生平平行事的铺陈,这是传记或评传的写法,溺于事则失于理,理论的高度即不易达到。

心态史领域的开辟需要许多学科的努力,因而随着交叉学科之科目及侧重的不同,心态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自必又会有种种差异;并且同这一领域研究的日益拓展相一致,心态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亦必将愈加明确和成熟起来。

我1986年就曾在拙著《中国中古诗歌史》中说过:“如果说一个具体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这个人具体人性之所在的话,那末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便是这个民族民族性之所在。”我们现在“需要对人性和民族性之具体所在的文化—心理结构作出探索,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召唤”。“在一个科技愈益发展的物化的世界环境中,文化—心理的因素,特别是审美的因素,将愈益突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对于民族性的探索更是一个牵涉到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重大的课题。”拙著之对于中古时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嬗变的

论述,乃是同对具有特定经历、命运因而将历史承继性、时代性及个体变异性凝为一体的诗人、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个体研究相联结的,并且还又是以后者为前者的感性显现和动态展示的,而前者恰恰又正是后者之在社会化浑沦勃动及其整合中所引致的张扬沉沦中凝定的。1990年,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更着力强调了人类及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意义)世界这一概念。此书注目于对人的感性,亦即人类精神的生成发展史作出凝定着人类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把握。在其《符号—逻辑的通天塔》一章中,我对世界作出了四重划分:人类以前即已存在原初的第一性的物质世界、现象界、认知世界、人文(文化—意义)世界——认知世界和人文世界绝非是割裂的,而是在现象界中一并孳育生长着的,亦即是共生着的;并且,现象界又正是依赖于认知世界与人文世界的生成而愈益拓展的。物质世界、现象界、认知世界、人文(文化—意义)世界,乃是彼此贯通、浑化着的几个层次;值得强调的是,这四个层次中,每一个较后的层次都具有对前一个层次的融摄性。

要之,具体、深入地推进对于人性、民族性及人类精神之生成发展的研究,以便由此探索和理解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所应有的走向,乃是我一贯致力的学术目标。我的文学史研究、文化—心理研究以及对心态史丛书的主编等工作,虽各有其对象的特殊性,其实都指向着一个共同的哲学方向。

我为审改这一辑丛书投入了8个多月的时间。拜读这些有才气的作者的大著,我获得了不少教益。在尽力尊重作者的前提下,我也尽量做了一些补苴罅漏、张皇幽眇的工作。这既是为了使本辑丛书尽可能减少些错误,也是为了将在确立选

题和拟制写作提纲时我和作者共同商量好的一些想法更完善一些地体现出来。但识力不足、照顾不周之处仍一定不少,作为主编,对于丛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自然是应首任其咎的。

四节代周,阳景骏逝。日月出矣,时雨既降,则爝火、浸灌为劳。秋水沛至,百川灌河,余乐见泾流之大,其将浩洋洋者矣!

兹为序。

1992年12月6日
于苏州大学海思书屋

目 录

总序	王鍾陵
----------	-----

第一章 晚明文人心态的时代背景

——文艺启蒙的曙光	(1)
第一节 狂飙突起的历史土壤与时代特色	(1)
第二节 晚明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潮的关系	(5)
第三节 晚明文艺思潮的三个阶段	(13)

第二章 晚期文艺启蒙曙光中的双子星座

——公安与竟陵	(18)
第一节 公安与竟陵个体意识品质之比较	(19)
第二节 公安与竟陵个体意识主动性之比较	(25)
第三节 公安与竟陵个体意识的风格表征之比较	(31)

第三章 商业精神:晚明文化活的灵魂

第一节 市场文圈中的文化市场化	(40)
第二节 审美趣味上的商业心理折射	(45)
第三节 士子心态矛盾的文化反观	(51)

第四章 小品世界:晚明文人的审美情趣

第一节 盎然的意趣 深蕴的哲理	(59)
第二节 诙谐的个性 传神的白描	(62)
第三节 富赡的词采 隽永的境界	(64)
第四节 多彩的人生 奇特的世界	(66)

第五章 自在:晚明文人生活方式和理想的新格局	(69)
第一节 精神的解脱:从理性到感性的超越	(71)
第二节 “人性美”:从现实到理想	(75)
第三节 名士风流:晚明文人生活态度及其心态表现	(85)
第六章 晚明文人的“自娱”心态与其时代折光	(93)
第一节 从郑元勋到黄宗羲	(93)
第二节 “自娱”心态的林林总总	(98)
第三节 “自娱”意识的思想渊源与社会土壤	(110)
第七章 自新:晚明文人精神的新动向	(125)
第一节 科学精神的崛起与中国传统文化	(126)
第二节 从单一化的人生追求到多样化的人生理想	(128)
第三节 “西学东渐”中的文人心态	(132)
第四节 晚明科学精神的意义与局限	(137)
第八章 自忤:生存文化危机中的晚明文人心态	(140)
第一节 荒漠行:梦与死的主题	(141)
第二节 忏悔:从浪漫到感伤	(146)
第三节 贵族的忏悔:此情悠悠,此恨绵绵	(150)

第一章 晚明文人心态的时代背景

——文艺启蒙的曙光

第一节 狂飙突起的历史土壤与时代特色

晚明，是中国史上一个转折的时代。

晚明文人，就是在这一个转折时代蹒跚前进的。他们的特定心态在社会审美规范的变动中呈现得十分充分；并且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种变动又正是文人们特定心态得以展开的一种时代的社会的背景。

作为文艺思潮的转折时代，在我国文艺史上本不止一个，而晚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时代，确有其特殊原因在。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包括文艺思想的争鸣，是一个转折；它标志着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变革。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又一个转折，表现为人生思考和人性探求在士林中蔚然成风。由于佛教思想的输入和玄学思想的兴起，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和儒家一尊的思想骤然改观。这两个文艺思想高潮，不能说不宏伟，不能说没有深远意义，然而从作为社会发展史最后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变革说来，晚明的文艺启蒙思想却更显示其空前意义。这正是说，这一次转折是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

封建思想牢笼中力图迸绝出一种新兴意识来，它在脱颖而出，在挣扎，“在破人之执缚”^①；它不仅承传和发扬魏晋的个性通脱精神，而且反映了市民群众的萌芽阶段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处于这一萌芽阶段中的先进阶层的要求。

由于这一个历史时代具有空前特质，所以锋芒所至，威力极猛。就当时的批评家而言，出现了许多较之魏晋风度更为放达甚或古怪的狂人。就其社会影响而言，出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文友并结成流派。例如，公安派的影响之大，导致了“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②；竟陵派则是继公安派之后，声势“大炽”^③。就其文艺通俗化的主张而言，散文小品由于重视真性情的流露和语言风格的新鲜活泼，其反映市井的风俗画的作品日益增加，过去的引经据典、刻意为文的因素逐渐减少；与城市经济发达相适应的文学潮流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总之，这一个新的形势确乎是过去所没有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反映了长期受封建禁锢而开始发出个性呐喊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从“掇拾陈言……死于古人语下”一转而为“能转古人，不为古转”^④的时代。这是一个从廊庙公卿文学而歌颂帝王，一转而为描写“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⑤的时代。

在这一个狂飙时代中，首先是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市民所向往的新事物。如果没有这些新事物，就不可能产生文学启蒙的新思潮。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文学理论批评的新观点。如果没有晚明苏州城的那种“箫鼓楼船，无日无之”^⑥的流行风俗，袁中郎就不可能写出作为绝妙的市井风俗画的《虎丘》游记，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于当时“独抒性灵”的文艺主潮发挥推波助澜作用，并印证其“趣得之自然者深”^⑦的观点。正